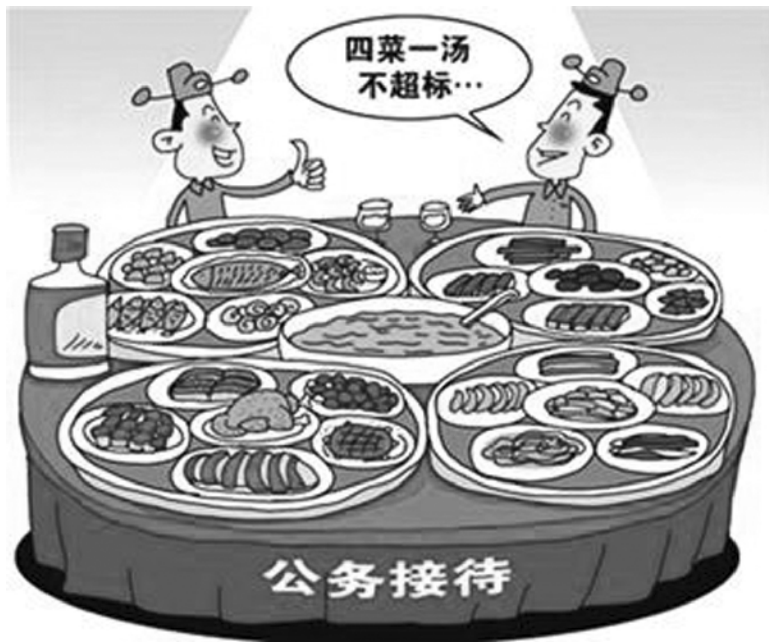


在古代,谁为公务接待买单?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旨在规范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规定》共分26条，对接待活动食、宿、行、迎送及警卫、预算和报销等关键环节提出了明确要求，包括严控接待范围、简化接待礼仪、限制接待住宿房型、从严控制接待用餐的次数和陪餐人数、规范警卫安排等。那么，在古代，谁为公务接待买单？

古代公务员接待：魏晋设政府接待办、明清排场最大

秦始皇建郡县制以后，官场就出现了接风饯别等宴会。《汉书》记载：“西汉后期，政局屡变，地方官调动频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州郡(相当于当下的省城)甚至设置了“送故主簿”(相当于政府接待办主任)这样专门负责接待的官员。宋朝时，政府曾明文规定“凡点检或商议公事、出郊劝农等，皆准公筵”，可见，古代官场是允许“公款接待”的。历代王朝也大都按照节俭原则，规定了不同级别官员的接待标准。

其实，按规定的标准做好接待工作，是公务活动的保障，本应无可厚非，问题是古代官场也和当今一样，不按标准接待，而是竞相攀比，排场越搞越大，于是惹得怨声载道。

【明兵部尚书礼礼塞满 1000 辆大车】

从明清官场情况来看，接待排场之风达到顶峰。明朝巡抚驾到的时候，府官、州官和县官，一律要跪在道路两旁欢迎。如果运气不好遇上刮风下雨的天气，

即使是知府，也避免不了“陷膝污泥”的命运。在清代，如果遇到钦差大臣经过，“数十里外设马为长探，二十里内设马为短探，无不竭力趋跽”，都想争取给朝廷要员留个好印象。

明代嘉靖18年，兵部尚书翟奎奉旨到塞上犒劳军队，边区文武武将都全身披挂到郊外恭迎，而且竞相送礼。等到翟部长完成使命返回的时候，财礼塞满了1000辆大车。官至南京兵部主事的管志道回忆说：“我在乡里做生员时，曾经亲眼看见一位县长向前来视察的巡按百般献媚，拍马屁一直拍到马桶上，甚至到了用貂皮来装饰尿壶、将缎褥铺在厕所里的程度。”

【下级公务员因未招待好上级羞忿自刎】

清代乾隆三十四年四月，广西学政梅立本到陆川县主持科试，陆川县杨县长承办接待。杨县长不仅包办了梅大人和他一大帮随从近一个月的饮食起居和各项供应，还雇人来代买物品，额外又花

了很多钱。尽管如此，梅立本及其手下人的需求仍未得到满足，继续多次刁难，并几度杖责杨县长派在学政身边听候差使的王升、陈忠等人。

迫于情势，杨县长去求情，梅立本又当面恐吓他说：“我与你虽然是同年，但是你办事不妥，我照样要参劾你！”杨县长非常害怕，不自觉地居然双膝下跪，说道：“卑职刚到任，很多情况不熟，还求您多多指教。”梅学政说：“你不懂就去问邻县的官员吧。”说完转入后堂，不再理会杨县长。

杨县长与梅学政本来是同榜出身，只因官运不济，地位悬殊，便一再受辱，以至于羞忿难堪，竟于靴筒中拔出小刀，在轿内自刎殒命。

【上级最爱收红包】

那么，古代公务接待中，上级最看重的是什么？答曰“现金红包”。而这个“红包”一般有3个名目组成：一是“程仪”，即车马费；二是“折席”，即宴饮费；三是“跟随”，即送给仆从的辛苦费。

古代公务接待：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在中国历朝历代，公务接待都是地方官们心中永远的痛。地方官们不办企业不炒股票，衙门公账上也没有公务接待的预算，哪来这么多钱开销分摊呢？讲实了，不外乎是向民众加征加税、争取“自筹经费”或说预算外资金。说白了，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苏东坡疲于应付公务接待】

明代万历二十三年，刚当上吴县知县才几个月的袁宏道写信给朋友说：现在已经知道人生作吏甚苦，作县令尤苦，作吴县知县更是苦上万万倍，比牛马还不如！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上官如云，过客如雨”，来来往往都要县令早晚接待。

《萍州可谈》记：杭州城极为繁华，因此北宋中央派赴该路的监司，大多在城内设立办事处，这个去了那个又来，以至杭州政府得专门安排一员副职陪他们吃喝玩乐。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时，就扮演过这个角色，因为不胜酒力，疲于应付，发牢骚说杭州通判这个差事是“酒食地

狱”。由此可见，基层官员应付公务接待、疲于奔命时是非常痛苦的。为了减轻这种痛苦，官员们各出奇招。还是这个苏东坡，据说在他任地方官时，一旦遇到公务接待的宴饮，都要召“小姐”来，让赴宴人的注意力转移到“女伎丝竹之声终日不辍”上，自己趁机休养精神。

【上司身边的人一定要应酬好】

官场内权力分配的基本原则，永远是上级掌握对下级的监察和考核，于是顺从乃至逢迎上级，变成了做下级的本分。再就是无论上级下级，往往都把能否做好公务接待看作是恪守本分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衡量标准。清朝人汪辉祖在他所写的“县长教科书”《学治续说》中，多次讲论了接待上司的重要性，特别是上司身边的人，一定要应酬好。并举例说：过去我们浙江有个好县长，省领导对他的印象一向很好。有一次省领导出行视察，经过他这个县，这位县长没能满足领导身边人的需求，那些人便使坏，暗中

把他接待领导的一应供给全部撤走，领导还当这个县长故意怠慢，大为生气，逮一个借口便将他参劾撤职了。

【公费吃喝必备：燕窝烧烤、鱼翅海参】

最有趣的是，因为朝廷一再强调要革除属员给上司送车马费的陋规，所以到后来钦差们都不肯现场收钱了，要改为等他们回京后，再通过钱庄把这笔钱汇到大人的家里去。宴饮娱乐什么的，张集馨也有记述，“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无论冬夏，戏宴总得到下半夜一点钟后才散，“群主”(即请客陪欢的地方官绅)先把诸贵宾一个个送出、上车，“然后逐次揖送”。等客人都回到下榻的馆舍，还要“着人持群主名帖，到客公馆道乏”，就是您辛苦了、请早点休息、晚安的意思。“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

据新华网

福

“福”文化的流传

康熙十二年，康熙皇帝题写的“福”字包含多子多寿多田多寿多福。

在诸子百家争鸣时，诸子百家通过各自的学说，形成了统一认识：把“福”字当作名词使用，并且赋予它丰富的含义。

首先是孔子及其弟子在《礼记·祭统》中表明自己的观点：“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谓之备。”他们把“福”字冠以“顺利”的含义。

擅长辩证法的李耳在《老子》中言：“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这里他把福大抵定义为“好运好事”的意思。

最终，儒家代表孔子在他整理的《尚书》上对福做了“归纳总结”：“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这就是说，福包括五个方面，即长寿、富有、健康安宁、美好品德和老有善终。这也就是后来流传较广的“五福”之说。从那时开始，“福”字积聚越来越多正面能量的信念，一步步植入华夏民族的血脉中。

后来，“福”也在民间流传，甚至出现了过年时贴“福”字的习俗。关于其来历，说法不一。最早的传说起于姜太公。姜太公封神时，他老婆也要请封，姜太公说：“你是个人败命，到我家来让我穷了一辈子，就封你穷神吧！”老婆不高兴了：“封我为穷神，叫我蹲在啥地方？”姜太公说：“有福的地方不能去！”从此，老百姓家家都贴“福”字，以驱穷神。

传说不可信，不过，最早有贴“福”确切记载的，是宋代钱塘(今杭州)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的记述：“士庶家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祀祖宗。”所谓“贴春牌”，就是把“福”字写在红纸上，贴在大门上。

据《黄河晨报》

趣味对联

谢觉哉撰联嘲绅士

谢觉哉 1884—1971，湖南宁乡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法学家。1905年7月，在湖南宁乡县为山区肖家湾这个僻静小村里，人们奔走相告：“谢焕南中秀才了！”

谢焕南是谢觉哉青少年时代的名字。他自幼学习勤奋，深得老师和同学的赞扬。21岁时，他承父命参加科举考试，成为中国最末一科的秀才。

谢觉哉的父亲很自豪，他决定办几桌酒席庆贺。

这一天谢家热闹非常，道喜的宾客络绎不绝，其中，也来了一些绅士。父亲忙叫谢觉哉出来陪客。但是寻遍屋里屋外，连他的人影都不见。

这时，一位绅士发现收礼的地方贴了一副对联，忙叫道：“你们快来看对子！”大家跑去一看，原来是谢觉哉亲笔书写的：

十数年笔舞墨歌，赢得一张倒票；

两三月打躬作揖，赚来几串现钱。

这副对联无情地嘲笑了那些道贺的绅士。他们顿时像泼了一盆冷水，高兴而来，扫兴而去。

原来谢觉哉很讨厌这帮绅士，对考中秀才这事，又极冷漠。因此，当父亲为他办酒庆贺时，他便写出这副对联，让绅士们自讨没趣。

谢觉哉中秀才后，一直不愿做官，而在家乡从事教育事业。后来，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